[文章编号] 1003－4684(2025)06-0066-05

翻译社会学视角下《红玫瑰与白玫瑰》英译比较研究

武 琦，肖家燕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借鉴 Pierre Bourdieu 的社会学理论，以《红玫瑰与白玫瑰》的 K.S. Kingsbury 和 C.T. Brown 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两位译者的惯习、资本和社会场域，比较、评述两个译本的差异。研究表明，尽管两位译者有着相同的英语文化背景，但由于二者具有不同的惯习、资本和社会场域，在动词、情感色彩词、句式结构及人名翻译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翻译方法。有过中国生活经验、熟谙张爱玲作品的 Kingsbury 较多采用多元化翻译方法，而 Brown 多拘泥于语言层面的对等转换这类直译法。这为《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英译评价提供了新视角，并拓展了翻译社会学的应用实践。

[关键词] 翻译社会学；《红玫瑰与白玫瑰》；K.S. Kingsbury；C.T. Brown

[中图分类号] I247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作家，张爱玲以其融汇古今、雅俗共赏的文风留下了众多文学瑰宝。其中，中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更是以细腻的人物刻画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广受文学界和文学翻译界关注。小说大约 3 万字，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三位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故事围绕主人公佟振保展开，讲述了他与“红玫瑰”王娇蕊、“白玫瑰”孟烟鹂之间的爱情婚姻故事。有关这本小说的英译研究较多集中于金译本（Karen S. Kingsbury），鲜少关注鲍译本（Carolyn Thompson Brown）及其翻译评介。陈贝纳[1]主要聚焦于两译本的翻译误差评析。金小月[2]利用张力理论讨论金译本中的张力呈现情况等。现有成果较少从翻译社会学[3]角度进行评述。翻译社会学认为翻译是从选材、流通到社会接受等各个环节的社会活动，对于翻译活动的理解不应局限于语码转换，而应该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场景来深入探索[4]。Pierre Bourdieu（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框架和视角。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倡以译者为导向的翻译研究，以译者的惯习、资本、场域为视点，全面探析译者的策略抉择和译文差异。“惯习”指译者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固定化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深刻影响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抉择与倾向。“资本”是译者在社会网络中逐渐积累的各类资源和优势，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些不同形态的资本之间能够相互传递和转化。“场域”指一个拥有独特运作规则的社会空间[5]。在翻译活动中，翻译场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其运作不仅遵循自身规则，还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布迪厄提出了分析模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6]，为解析翻译活动和译文评价提供了新思路。具体而言，翻译活动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规则限制是译者所处的社会场域，场域变化会导致译者惯习和资本的变化；拥有更多资本的译者往往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能够更好地适应翻译场域中的规则和限制；译者的惯习主要体现在原文的理解和译文表达，而“理解和表达”惯习不断被场域和资本所塑造和改变。因此，译文是译者的惯习、资本和场域共同作用、相互作用的结果。鉴于此，本文在翻译社会学视角下，比较分析《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金译文和鲍译文的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内在因素。

1 译者惯习视角下的译文比较

“惯习”由参与者在长期的社会轨迹中习得积累而成，可以生成常态的实践方式、感知理解能力、世界观，是一个动态、多元的概念，有别于静态的个人背景[7]。金凯筠早期在中国生活，翻译出版过多部张爱玲的作品，随着其惯习的形成和固化，她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放电影”[8]的翻译思想。相比之下，鲍凯琳的社会轨迹使其形成了与金凯筠截然不同的译

[收稿日期] 2024－04－24

[基金项目] 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2ZD069）

[第一作者] 武 琦（1999－），女，山西太原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

[通信作者] 肖家燕（1966－），女，湖北谷城人，文学博士，湖北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及典籍翻译研究，认知诗学，应用语言学。

者惯习。没有资料显示鲍凯琳曾在中国生活，或其他翻译张爱玲作品的经验，其翻译风格趋于传统，恪守英语规范，力求重现原文措辞。如下例所示：

例 1：娇蕊抬起……看着……站直……好像很诧异……她找到……取出……，侧着……一照，草草……掠两下……擦眼睛，擤鼻子，……都不朝他看，就此走了。[9]

鲍译：Chiao-jui lifted…stared at…standing upright… surprised…foundher purse, picked up the small mirror, andturning her head … carelessly brushed her hair back. She wiped her eyes… blew her nose…looking…she left.[10]

金译：Jiaorui lifted…stared…stood straight up … astonished … took a small mirror out of her purse, glanced into it whiletilting her head…tossed her hair back loosely, wiped her eyes… blew her nose…looking…walked out.[11]

本句是王娇蕊在发觉自己爱上振保之后，写信向丈夫坦白，并要求离婚，获得自由以重嫁振保。振保知道这件事后，冷漠、无情地拒绝了她，而娇蕊并没有哭闹，其反应也令振保感到意外。这里张爱玲连用十二个动词，紧凑果决、干脆利落，一个勇于追求爱情，被拒绝后也敢于放手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两个译文在翻译这一系列动词的时候，表现了不同的理解与表达。首先，鲍译文在表示“诧异”这个情感词时，运用 surprised，表现的震惊程度不如 astonished 强烈。娇蕊在一番痛哭之后，意识到眼前的男人是不可能同她在一起的，对之前自己妄想拿眼泪挽回那个男人的想法感到可笑，可见，金译文将娇蕊大起大落的情感表现得更加充分，塑造了一个更为立体的娇蕊形象。其次，金译文将“找到她的皮包”译为介词短语，减少了译文中动词数量，使译文更加简洁流畅，符合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另外，在翻译“草草把头发往后掠两下”时，鲍译文选择 brushed，同时用 carelessly 修饰它，无论动作还是感情上都轻微平淡，表现了娇蕊迅速整理自己仪容和感情之后归于冷静，对眼前男人丝毫不在意的态度。金译文使用 tossed，表示愤怒或轻蔑地甩头发，动作和情感程度都较深，刻画出娇蕊在认清振保缺乏担当、畏首畏尾的真面目后，毅然离开他的决心以及对振保的不屑与鄙夷。对比发现，鲍译文用词更为平和，呈现出一种更为冷静和克制的氛围。而金译文选用情感色彩较深的词汇和生动的动词，成功塑造了一个敢于追求爱情、勇于面对现实的女性形象。

例 2：脸色苍黄[9]

鲍译：…… his coloring was agreenish yellow.[10]

金译：His face was sallow.[11]

“苍黄”这个词语是对孟烟鹂出轨对象“裁缝”的外貌特征的生动描述，张爱玲巧妙使用“苍黄”复合词，既表现了裁缝面色的病态，又增添了文学色彩。“苍黄”用来指黄而发青[12]，鲍凯琳选择直译，将“苍黄”翻译为 greenish yellow。语义上忠实于原文，但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可能难以准确理解这种复杂色调的隐含意义或文学韵味。而金凯筠作为熟稔中国文化的汉学家，采取了意译法，将“脸色苍黄”译为“sallow”，这个词在英语中常用来形容人面色不健康。这种翻译方式不仅让英语读者更容易地理解裁缝的面色状态，也更好地传达了原文中的情感色彩和隐含意义。这二者不同的译文，反映了两译者各自不同的翻译惯习，鲍凯琳较注重语义对等，而金凯筠则更注重读者的接受度和语用对等。

金凯筠 1961 年生于美国加州，其学术之路始于惠特曼学院，专攻英语文学。毕业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金凯筠作为“惠特曼中国行”的首批学生赴昆明交流。1983 年，她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英语[13]。1984 年，她为了爱情而返回西雅图，不过，这次经历使她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并引领她踏上探索中国文化的道路。金凯筠对中国的喜爱以及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逐渐内化形成了她研究中国文学的初始惯习。返回美国后，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在著名华裔学者夏志清和王德威的指导下，相继完成了硕博阶段的学习。夏志清曾极力推荐她研究张爱玲的作品[8]，而她也被张爱玲小说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戏剧张力深深吸引。之后，金凯筠开始翻译张爱玲的小说，如《倾城之恋》和《封锁》，散文《天才梦》和《必也正名乎》等，这表明，其偏爱张爱玲作品的译者惯习已初步形成。随着金凯筠对张爱玲作品的深入研究与大量翻译实践，她的译者惯习逐步定型，同时她对翻译的感悟也日臻完善，她认为文学翻译的过程就如小说在脑海中转化为电影画面，随后译者再运用全新词汇将这些影像画面巧妙重构为书面的叙事。张爱玲的作品便充满了电影式的叙述手法和高度影像化的场景[14]，比如例 1，张爱玲使用一连串动词，营造出强烈的动态感和影像感，在翻译过程中，金凯筠也自然而然地将这种视觉化的叙述方式融入到了译文之中。另一方面，她倡议[15]世界应当广泛关注张爱玲的作品，因为即使在文化背景、价值观不同的美国，张爱玲的作品也同样能引发人们的共鸣，带给读者情感的满足和享受，而且能够启发读者思考，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因此从这一视角出发，她的翻译旨在

服务于美国读者与社会。相比之下,鲍凯琳于1943年出生于美国布鲁克林,她的父亲毕业于美国常春藤盟校,她的母亲优雅、精致,充满艺术修养,她从其母亲中国风的家庭装饰和家庭图书馆的一些书中间接了解到中国。1965年进入康奈尔大学后,鲍凯琳便选修了中文课程并以亚洲研究为专业。1968年她继续在康奈尔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1978年向美国大学文理学院提交了自己翻译评介的《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翻译及译后记》,并顺利获得美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在翻译《红玫瑰与白玫瑰》时,鲍凯琳只是名学生,较少的生活阅历决定着她用词更为柔和,更多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

2 译者资本视角下的译文比较

"资本"指人们在其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及话语权是由他们在某一特定场域所拥有的资格所决定的。翻译场域中,译者会根据持有的资本数量采取守成或颠覆策略[16],若持有资本较为雄厚,一般更敢于采取颠覆性的译文;若资本相对比较薄弱,往往更加严谨保守地处理文本。在《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英译中,金凯筠表现为前者,而鲍凯琳倾向于后者。例如:

例3: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朱砂痣。在振保可不是……也就变得仿佛理想化了,万物各得其所。[9]

鲍译:Perhaps each man has had these two kinds of women, at least two……ruddy skin mole. But it wasn't this way for Chen-pao…… Thus everything was put in its proper place.[10]

金译:Maybe every man has had two such women — at least two……a scarlet beauty mark just over your heart.

But Zhenbao wasn't……it was idealized: then everything fell into place.[11]

这段文字不仅富有诗意,而且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张爱玲通过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比喻,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同时,这段话也展现了振保人物角色的独特性格和人生观。对比两个译文,鲍译文更倾向于保持原文的自然段结构,金译文则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拆分与重组,比如将原文拆分成两个自然段,凸显文本的逻辑关系。

此外,据统计,《红玫瑰与白玫瑰》文本共有138个自然段,鲍译文中有141段,而金译文却多达330段。此数据进一步验证了金译文对原文处理的自由度和灵活性,通过拆分和重组段落,更好地展现原文的层次感和深度,而鲍译文则相对保守,在段落结构上基本与原文保持一致。

例4:振保从来不大看见她这样的矜持地微笑着,如同有一种电影明星,一动也不动像一颗蓝宝石,只让梦幻的灯光在宝石深处引起波动的光与影。[9]

鲍译:Chen-pao had not often seen this reserved smile, like the smile of a certain kind of movie star, like a still sapphire which allows shifting light shining into the stone's depths to produce moving lights and shadows.[10]

金译:Zhenbao rarely saw her smiling so serenely, almost like a movie star; suddenly she became a sapphire from whose depths a flickering lamp draws waves of light and shadow.[11]

这句话描述的是振保对娇蕊罕见矜持微笑的印象,她的微笑如电影明星般优雅,静如蓝宝石,展现了娇蕊的迷人魅力。两位译者都试图传达原文含义,但在句式安排上存在显著差异。从整体风格上看,鲍译更偏向于直译,力求保留原作的韵味和风格,句式结构也与原文保持高度一致,通过较为紧凑的句式,将原文中的多个元素和比喻连贯地串联在一起,但这样使得译文略显冗长,尤其是后半部分,通过一系列的定语和从句来描述蓝宝石,句子结构较为复杂,在表达上显得生硬,缺乏一定的艺术性和感染力。相比之下,金译使用了更为松散和流畅的句式,在保留原文意义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简化,采用分句的形式,将整句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描写振保很少看到娇蕊如此矜持的微笑,几乎像电影明星;另一部分巧妙地将明喻句改写为暗喻句,表明娇蕊突然变成了蓝宝石,译文更具动态感和画面感,句子更为简洁明了,也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上述实例分析表明,鲍译文忠实于原文的句式和语篇布局,但可读性不如金译文,金译文在句式调整方面,比鲍译文更加灵活机动,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她们各自拥有的资本差异有关。首先,金译文在翻译场域中具备丰富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金凯筠在中国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时光,其间,她先在重庆教英语,后赴台北学习汉语,并在台中市的东海大学执教英语文学长达十四年[13],这一系列的职业经历与求学过程令她积淀了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知识,进而转化为其独有的文化资本。此外,香港出版的《译丛》上曾多次刊登金凯筠翻译的张爱玲作品,1995年,金凯筠翻译了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倾城之恋》,其毕业论文亦以张爱玲为研究对象[8]。至此,

金凯筠已成为张爱玲作品的“御用”翻译，积累了一定学术与翻译权威。另一方面，随着张爱玲多部作品被成功改编并登上大银幕，张爱玲的声誉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文学场域中，原作与原作者的象征资本得到显著增强，并逐渐渗透到邻近的翻译场域中，从而使译者的象征资本也随之提升，金凯筠因此赢得了更多的专业声誉，获得了更大的翻译自主权。与金凯筠不同，鲍凯琳仅通过课程学习中国历史、语言和文学，也缺乏对张爱玲作品的深度研究，因此鲍凯琳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较为有限，从而导致她在翻译过程中更为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与结构。

3　社会场域视角下的译文比较

译者的“社会场域”指译者所处的客观社会空间，其中包含了各种子场域，如文化、经济、政治等。这些子场域通过不同的权力和资本分配，形成了各自的规则和关系网络。鲍译文和金译文相隔数十年，译者所处的社会场域不同，社会场域中的不同力量作用于译文。例如，经济力量会影响译者的认知与生活经验；政治力量则会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或规定来影响翻译活动的内容等。如下例：

例 5：肥皂沫子[9]

鲍译：soap suds[10]

金译：shampoo[11]

例 5 出现在王娇蕊第一次出场时，正在洗头发的她从内室走出，顶着一头肥皂沫子，似云石塑像一般。原文中“肥皂沫子”是指用洗护用品将头发打出泡沫，鲍译使用“soap suds”，而金译选择“shampoo”，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在于译者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鲍译时间在 1978 年前，洗发产品不像现代这样丰富多样，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不高，肥皂作为日常清洁用品，既经济又实用，因此肥皂成为当时人们洗头时的首选[17]。金译文产生于 21 世纪，人们对头发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认识到肥皂的碱性较强，长期使用会导致头皮干燥、瘙痒等问题，于是肥皂洗头逐渐被淘汰。随着科技的进步，洗发水等专门的洗发产品得到普及，更符合英语社会生活的实际场景，金凯筠使用了更易于读者接受的“shampoo”。此外，其他用品名称的译文也表明场域变化及其影响。

原文共出现 10 个人名，6 个地名，除去外国人姓名及地名，余下 7 个人名和 4 个地名。鲍凯琳在翻译时采用了威妥玛拼音，这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制订的一套科学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玛拼音在当时的国际交流中具有一定的通用性，是 20 世纪中文主要的音译系统。而金凯筠直接使用汉语拼音来翻译。这是因为 1978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18]，绝大多数威妥玛拼音逐渐被汉语拼音取代，标志着汉语拼音开始成为官方认可的拼写方式。

表 1　鲍译和金译的部分人名、地名翻译对比

人名	鲍译	金译
振保	Chen-pao	Zhenbao
王娇蕊	Wang Chiao-jui	Wang Jiaorui
孟烟鹂	Meng Yen-li	Meng Yanli
地名	**鲍译**	**金译**
江湾	Chiang-wan	Jiangwan
一品香	I Pin Hsiang	Yi Pin Xiang Restaurant
东兴楼	Tung Hsing Restaurant	Dongxing Restaurant

如表 1 所示，翻译场域受经济、政治等场域的影响。自上世纪 70、80 年代至 21 世纪，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社会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如金凯筠在《倾城之恋》英译本的序言[19]所说，现今的年轻人已置身于多媒体时代，与张爱玲生活的那个年代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很多母语是中文的台湾学生都认为张爱玲的语言晦涩难懂，所以金凯筠在 2007 年翻译这部小说时，更倾向于采用符合当代读者认知的词汇，并且在人名翻译上使用了国际上广泛接受的汉语拼音。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受到当时国际交流环境和经济场域的制约，鲍凯琳选用威妥玛拼音和“soap suds”等具有时代特色的词汇，是与当时的社会场域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上述译文的差异，正是基于译者各自所处的社会场域而产生的，这也从侧面展现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社会性。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译者的惯习、资本和场域共同作用于译文，从而使不同译本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和语篇特征。鲍译文反映了译者作为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惯习，在翻译过程中，注重语言层面的对等转换，多用直译法。相比之下，金译文反映了译者作为资深汉学家的惯习，她在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历与深厚的知识储备，拥有更多的语言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的资本，进而养成符合自身经历的惯习，翻译方法灵活多样，呈现多元化。译文的差异，不仅体现了译者的翻译惯习差异，也折射出译者在翻译场域中资本积累过程的差异。尽管两位译者所处的文化语境基本相同，但因译者的惯习、资本和社会场域不同，而产生了差异明显的译文。由此，翻译社会学为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评价视角和研究思路。

[参 考 文 献]

[1] 陈贝纳.《红玫瑰与白玫瑰》英译评析[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2] 金小月. 金凯筠译张爱玲小说的语言张力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23.

[3] JIAYAN X, YANG B, CHILI L. A Review of Translational Sociology: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and Society[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3. Volume 14-2023.

[4] 周领顺. 社会路径的翻译研究:一个批评性视角[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3(03): 97-104+148-149.

[5] BOURDIEU PIE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b: 162.

[6]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1.

[7] THOMPSON J B. Editor's introduction[M]// Bourdieu, P & J. B. Thompson (ed.).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R. Gino. & A. Matthew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1-31.

[8] 张丹丹, 刘泽权.《倾城之恋》英译修改及其经典化过程[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0(05): 102-108.

[9] 张爱玲. 红玫瑰与白玫瑰[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1-290.

[10] BROWN C. 1978. Eileen Chang's "Red Rose and White Rose": A Translation and Afterword [D].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978: 1-97.

[11] EILEEN CHANG. Red Rose, White Rose[M]. Trans. Kingsbury Karen.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7: 1-39.

[12] 商务国际辞书编辑部.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17: 99.

[13] 覃江华. 语言钢琴师——美国汉学家金凯筠的翻译观[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1(02): 121-125.

[14] ESPOSITO SCOTT. Reading the world: karen s. kingsbury interview [EB/OL]. (2007-06-12). [2024-04-20]. https: // blog. sina. com. cn/s/blog _4a9f19cd0100sc5q.html.

[15] 朱振武.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247.

[16] 宫留记.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51.

[17] 陈婷. 从皂角到香波——洗发水进化史[EB/OL]. (2015-04-10).[2024-04-20]. https: // lswhw.ustc.edu.cn/index.php/index/info/1919.

[18] 辛献云. 谈汉语人名翻译的规范问题[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01): 65-69.

[19] EILEEN CHANG. Love in a fallen city and other stories[M]. Trans. Kingsbury Karen. London: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2007: 22-23.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Red Rose and White Ro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Sociology

WU Qi, XIAO Jia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Drawing on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Red Rose and White Rose* by K.S. Kingsbury and C.T. Brow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explore how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capital, and social fields interfere with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spectively, and how many differences resulted. It is found that these two translators in the same cultural context, have adopted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due to their individually different habitus, capital and social fields, in translating verbs and emotion-loaded words, sentence patterns and names of goods and the characters. Respectively, being an experienced translator both in sense of living in China and translating Eileen Chang's works, Kingsbury adopted more multi-translation strategies, whereas C.T. Brown adopted more literal translations, achieving linguistic equivalence as a less experienced translator either in China society or translating Eileen Chang's work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n critical comments up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Red Rose and White Rose*, enriching and expanding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al Sociology.

Keywords: Translational Sociology; Red Rose and White Rose; K.S. Kingsbury; C.T. Brown

[责任编校: 赵 瞳]